

·人物专访·

20世纪80年代体育改革中几个问题的回顾

——访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

傅砚农，古柏，李岩

采访者注：张彩珍，女，浙江宁波人。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毕业。1954年从宣传部门转入体育战线，曾多年任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任国家教委委员，并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等职。1991年底退居二线后，担任过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中国老年体育协会主席等职。2001年离休。

在40多年的体育工作中，她参与了体育大政方针的制订和实践，在体育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她发表过不少文章，有的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论文，有些被选入多部文集。她还与人合作写过几部报告文学作品，受到国内外读者欢迎。她善于思考，勤于笔耕，被视为体育界的智囊人物和女秀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后，体育工作开始一边调整、一边改革，拉开了体育体制改革的序幕。至1986年4月下发《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前，我们将其称为体育界进行改革的起步阶段，它为后来的全面改革打下了基础。当我们试图对这一阶段的改革进行历史性分析、评价的时候，感到在当时，一些改革思路的形成，一些重大举措的出台，有重要的背景。而有些背景因素是文件、报纸和会议纪要上未披露的。为此，我们采访了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

问：作为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方针政策制订的国家体委领导人，您曾参与了许多体育改革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体育界在拨乱反正后，一边调整，一边改革的阶段。这一阶段，为后来的体育改革打下了基础。李梦华主任曾在1985年说，体育改革还没形成系统的思想，希望专家提出建议。我们感觉，当时体育界是为解决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而着手进行改革，请问当时体育改革的背景是什么？

张彩珍(以下简称张)：促进体育改革的关键动因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决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强调要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体育改革的。1979年11月，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这是个促进因素，但这是在改革一年以后的事了。发展体育的路子不活、

不宽，体制上存在“过分集中于国家办体育”的主要弊端，也是迫切需要改革的动因。主要还是大环境起决定性作用，要是国家不改革，国家重心不转移，体育能转移吗？“文革”前，我国有13个世界冠军。“四人帮”10年破坏，1976年世界冠军是零，已经掉到沟底了。所以，1979年2月全国总工会决定要侧重抓提高，解决这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问：经过拨乱反正后，又面临参加奥运会，确定省以上体委工作侧重抓提高，能不能抓出成效，当时有把握吗？

张：侧重抓提高，是时任体委副主任李梦华首先提出来的。梦华这个人内秀，有思想。这项改革措施得到了以王猛为主任的体委领导班子的支持。全国总工会通过并报中央批准。

侧重抓提高，三年就开始见成效。抓体育，不像搞生产那么难。经过努力，1980年至1982年就产生了57个世界冠军。1984、1988年两届奥运会共获20金、19银、21铜奖牌。1984年奥运会成绩有虚高的部分，苏联、民主德国没去，但也去了罗马尼亚等140多个国家。成绩是我国健儿奋勇拼搏得来的，是世界公认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荣获奥运第一枚金牌的射手许海峰颁奖时说：“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伟大的一天”。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绩不理想，主要是金牌少，只有5枚，列第11位，而奖牌总数列第7位，总分排第8位。比1984年奥运会分别排第6和第7都只差1位，奖牌总数只差4枚。我国健儿主要是

临场发挥差,技术潜力还是有的。如游泳“五朵金花”,拿了5银,到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庄泳等4朵银花都变成金花了,还有一朵小花乐静宜也拿了一金,游泳共获5金。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看,我们金牌第二,奖牌第三,而俄罗斯金牌第三,奖牌第二,他90块,我63块,俄总体实力比我强。金牌偶然因素多(有的只差0.01秒),奖牌数反映的是总体实力,这是事实,也是共识。我们应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成绩好时肯定一切,成绩差时否定一切。

问:新中国老一代体育领导人对“东亚病夫”有特别深的印象。受这种心态驱使总希望通过迅速提高运动成绩等来证明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改革开放的契机,又使体育界想尽快地把“文革”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因此有一个比较高的期望值,如20世纪内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您是如何看的?

张:是的。我们这一代体育人首先要尽到甩掉“东亚病夫”的历史责任,并由此开拓变体育弱国为体育强国之路。1979年2月全国总工会上提出“为使我国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而奋斗”。这是响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召,当时对实现体育强国未提时间要求和具体标准。1983年全国总工会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主要标准有:普及城乡体育运动,运动技术达到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拥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并订了一些指标。会后形成《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文件,得到国务院批准。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出“现在具备了把体育运动更快地搞上去的条件。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体育强国”。

1985年,我主持开了一个研讨会,学者们对“体育强国”的标准提了些看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从经济角度考虑,认为国家经济水平不高你就成不了。一种认为体育运动的发展可以适度超前。例如我国成为亚洲体育强国时,人均才350美元,而台北、香港、新加坡是四五千美元。我国在第九届亚运会上金牌第一,外电马上说中国不再是世界体坛病夫。现在回头看,“体育强国”的有些指标订高了,有的不大科学,如要求大多数项目达到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强国并不要求所有的或大多数项目都上去,这也不可能做到。民主德国是体育强国,其群众体育开展了很多项目,高水平竞技只搞18个奥运会项目。他们通过体育运动成绩扩大影响,争取国际承认。有人说他们靠兴奋剂才搞上去的,这是片面的,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的科学训练方法很多。

我不赞成有的人拿历史上某项运动会的成绩来说中国竞技体育超前经济350年,也不赞成把奥运金牌按人头平均计算。这些都不科学。经济上要算一下人均,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吃饭,而金牌怎么能人均呢?这样算,我们赶上美国要拿300多块金牌,1984年奥运会金牌总数才200多一点,全拿过来都不行,那大国永远落后,我们是乒乓强国也就变成乒乓弱国了。

问:现在看来,当时提出“体育强国”的目标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不能说是错的?

张:是有大环境的影响,更应该看到体育界思想解放,理论上坚持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能够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实践中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就表扬中国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和乒乓世界高峰给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乒乓精神被人民誉为“祖国之魂,民族之灵”。后来,中央领导又倡导发扬女排“为祖国荣誉而顽强拼搏的运动员精神”。1984年,中央高度评价在第23届奥运会取得的历史性突破的成绩,指出它标志我国踏上了体育强国的新里程,体育战线的重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我看到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撰文回顾建设造船大国和强国的历程颇有感慨。他说,这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开始提出进世界五强、三强,感到目标很高远,结果提前排名世界第二,我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也大有希望。他强调:“一个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寻找智慧的民族,才能承前启后,高瞻远瞩,走得更好更远”。

刘鹏局长刚到任时,拜访了李梦华、荣高棠之后,召集体委副主任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发言谈到,关于建体育强国,体育界是有些人持有异议的,有的学者认为不可能超前于经济,有的领导干部怕承认是体育强国就得多拿金牌,少了会引起群众不满,甚至会被拉下马。你一来就面临奥运会,压力很大,你可以不提体育强国,我们理解,但不能批判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当年参与决策的老主任至今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目标是订错了的。

问:您认为我国现在已经是体育强国了吗?

张:是!李岚清2002年在纪念毛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50周年会上讲:我国已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列。散会时,我提醒在职的一位局领导:这可是管体育的副总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的。他苦笑说:有人还提出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要超过美国,压力太大啊!我认为,李岚清讲话与原订2000年建成体育强国的时间差不多。2000年悉尼奥运

会我国金牌、奖牌数皆列第三之际，国内就有议论说我国已冲进第一集团。从原订4项强国标准看，也可说是基本达到了。先说“运动技术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这是体育强国最鲜明最主要的一个标志。足球强就称足球强国，乒乓强就称乒乓强国。欧美一些体育发达国家群众体育普及，但竞技水平不高，没人承认他们是体育强国。从我国近20年来参加4届奥运会成绩看，第25~28届金牌、奖牌数都列前4位之内。2008年，在体育报刊上看到有人还在说，我们是第二集团前列，还不是体育强国。难道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就美俄算体育强国、第一集团、第一流吗？只此两家能构成“集团”和“流”吗？我认为，面临北京奥运会应当低调宣传我国运动成绩，留有余地，但不能直接否定事实，也应实事求是。

我们原订目标并不仅是竞技体育强国，对群众体育、体育设施、体育队伍等都有要求，是比较全面的。依我看，我国群众体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虽不如一些发达国家，但很有特色，已具相当规模。人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人均寿命70多岁，是全球进入“70岁俱乐部”的90多个国家之一。当然，中国人体质还不够强壮。还应看到，我国已拥有一批现代化体育设施、先进科技成果和一支努力“四化”的体育队伍。体育强国的标准还会与时俱进，日趋全面和完善。体育强国的建设，主要是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继任者率领体育界在举国关怀支持下继续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老一代只是起草了蓝图，开了一个好头。

问：您长期分管体育科研工作，您认为科研在推动体育改革、推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上起到了哪些作用？

张：早在1978年1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迅速攀登体育运动技术高峰”的同时，就提出了要“大打体育科研之仗”，科研必须先行。后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体育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要面向体育实践。邓小平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也用到体育上了。

我送你们1990年出版的《论体育》一书，书中《向科学要金牌》等文章可供参考。在实践中，科研工作为决策、为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李宁在世界杯赛一次拿了6块金牌，其中一块是根据体科所提供的世界体操技术创新的最新信息，李宁在比赛中运用发挥出色而取得的。

问：您当了两届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这个研究会在体育改革发展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张：1985年成立这个研究会是在体育改革的一个成

果，对体育体制是一个突破，也实现了我的一个夙愿。1954年，贺老总从西南局宣传部调我到国家体委时说：“文人进武庙”。我进来后常强调“体育界猛将如雨，还需要谋士如云”。中央1984年《通知》中指出：“各级体委都应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研究制订体育发展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这为研究会的成立提供了契机。研究会广纳群贤，聚集了一批学者、专家等智囊人物。它对体育战线起到了“思想库”的作用，促进了体育部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更好地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最著名的是提出了全民健身战略与奥运战略协调发展，后来在实践中形成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与奥运争光计划。新华社评论我国健儿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成绩空前，指出“奥运战略叠成金银铜牌”。这个战略对全运会也很有指导作用。辽宁三大球各设一、二、三队，共9个队，六运会拿了几个冠亚军，但只得了25分。而上海游泳选手沈坚强却拿了63分。体育报头版报道辽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项目战略布局，后来成绩改观。搞奥运战略也得罪了一些人。如建议压缩占专业队人数40%的三大球，加给既是金牌大户、又是基础项目的田径、游泳，使之各占20%、10%。我还提出足球定位应准确，宣传要降温。引起了足球界一些人的不满，好在得到了足协主席年维泗等多数人的理解。有一次，他在《奥林匹克之夜》大型晚会彩排时说了一句“祖国啊，总有一天我们要抱个金杯给您！”我劝他正式上台时改成“为祖国争光”。他改词了，但电视台觉得不过瘾，录播时仍用了彩排中的“抱金杯”。记得袁伟民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女排获得1984年奥运会冠军的情况时，胡耀邦问及本世纪足球能不能上去？分管体育的万里说上不去，我们基础差，人家小孩会走路就踢球玩，我们是长大后才学，体质也不如人家。全世界那么多人搞足球，上去难度太大。现在关心询问足球在北京奥运会前景的人很多，我常答以刘鹏的那句话：“踢一场人民满意的球”。即令输，也不能溃败嘛！女足希望能实现商瑞华教练所提：进四强。

可惜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一度行政化，不少学者专家被换成官员，削弱了“外脑”的作用。去年，我问总局政法司长张剑，刘鹏当会长的这一届发展战略研究会还有专家学者吗？我欣慰地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总不能行政长官给自己参谋，路子越走越窄嘛！

问：1983年国家体委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就提出“继续开辟国际体育商业性活动的渠道，以及运用体育电视、广播、广告等扩大财源”。这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

这种超前设想有什么背景吗？

张：除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外，主要是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特色道路中遇到的新问题，借鉴发达国家一些做法。体育对外交往多，天天在“横向比较”，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体委思想比较开放。例如，我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始总是派专业队去打外国的学生队，渐渐感到不妥，便提出由教育部组织学生队去参加。起初他们不敢接过去，怕业余队成绩不好引起群众不满。我们催了几届才办成。体委还提出高校、大厂矿、行业办高水平运动队这一改革措施，提高学生运动成绩。

问：您曾是国家体委的领导之一，参与过很多重大改革决策。从1979年工作重点转移之后，至80年代中期，体育工作是在一边调整、一边改革进程当中，您认为那一段时间有哪些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张：体育社会化是比较成功的。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社会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突破口。社会化的具体措施，除了前面已讲到的放手让高校、行业、大工厂办高水平运动队（像现在清华、北京理工大学那样）之外，还放权省以下也可办市一级专业运动队，把路子搞宽、搞活。荣高棠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研究，提出管理体育要抓好纵横两条轴线的改革措施。横线是全面部署运动项目布局，优先抓奥运项目。纵线就是抓好一、二、三线队伍，三线是传统项目学校，全国有2万多所，二线是重点业余体校、体育中学、竞技体校等，一线是专业队。训练体制强调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把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各个渠道和体育系统各层次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大家来办体育。这样逐步形成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格局。这是参照西方很多国家的经验，按国家—社会原则办体育。在美国，国家也不是一点经费不给，但它主要是靠社会来搞。

问：搞社会化为什么要从体制上着手改呢？

张：因为体制是组织保障，你不从体制上改，权在他手里，他不放权就改不成。如竞赛改革，提出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少数民族运动会、职工运动会改成由体育部门会同民委和工会来办，他们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把这条用法的语言落实到体育法上，全国人大审议时，工会、民委的代表都赞成通过。

还有一个改革就是实行重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梦华说运动员夺得奥运冠军给8000元，一个老司长说梦华发疯了。李宁那次拿了三金两银一铜，应得奖金4万多元，但那时我们思想解放的还不够，

不敢发这么多，只给李宁2.4万元，计算奖金时是按金牌递减的，拿第二块、第三块的奖金越来越少。很快，我们发现这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下一届就改了，每拿一金就给一金的奖励。不仅鼓励了运动员，在文艺界、杂技界等都引起了轰动效应，纷纷来学，促进了社会进步。

问：回过头来看，那个时期提出的改革内容中，不足的是什么？

张：我们在提出社会化的同时提了科学化，这是正确的。但不足的是科学化抓得很不够，没有做到使社会化和科学化真正成为体育腾飞的双翼。再有，就是对发展体育产业认识很不够。我说过这话：亚洲体育强国不是靠政府给钱建成的么，建世界体育强国也得靠政府，这是单靠吃皇粮的思想。把体育产业发展起来像现在这样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三驾马车，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继任者进一步改革的硕果。足球运动成绩虽不理想，但在改革中足协市场运作还是见成效的，足球经费基本上不靠政府拨款。

问：是不是可以说，80年代的整个体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思路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张：应该说，当时思想解放、措施得力、战略正确，成效明显。20世纪80年代已初见成效，改革30年大见成效。我还是举世界冠军数为例吧，这是升国旗、奏国歌的，不同于一般的成绩。建国至2007年，我国共获得2162个世界冠军，改革开放以来获得2132个，占总数98.6%。80年代所获冠军数，占建国至80年代末总数的90%。以上这些说明了随着改革的进程，体育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运动技术水平日益提高。北京奥运会就是改革开放最亮丽的硕果。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还有赖于体育界新一代领导和广大战士像接火炬棒一样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坚持改革开放，铸造新的辉煌。

（采访稿已经张彩珍本人审阅）

采访者单位：鲁东大学体育学院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编辑：李寿荣】